

闻一多在武汉大学事迹的几点考辨

唐 达 晖

20年代与30年代之交,闻一多曾在武汉大学工作近两年。这段时间,是他一生中从诗人时期到学者时期的转折点,因此也是他人生道路上重要的一站。

由于时间短,没有重大活动,留下的历史资料也不多,闻一多的这段生活经历并不很为人注意,以致有些史实至今还比较模糊,有些基本事实一直是众说纷纭。本文拟根据武大校史资料及其他有关资料,对一些问题试作一番考核辨正的工作。对比较复杂的问题,又还没有确凿证据的,则只提出一些历史事实和初步看法,以供参考,而不遽下断语,以免以讹传讹。

一、是不是中文系(或外文系)主任

闻一多在武汉大学担任什么职务,这个问题长久以来没有一个公认的正确答案。

1948年开明版《闻一多全集》第1卷收录的闻一多《事略》和《年谱》,说法就互有差异。《事略》^①说闻一多于1928年“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”;《年谱》说是任“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”。分歧点在于是否有兼职。此后几十年里,后一说得到广泛流传,而出现最早的《事略》的说法,却几乎销声匿迹了。

1980年,程千帆先生在给《新文学史料》的一封信中,对“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”一说提出异议,认为它“似于事实有出入”,“闻一多在武大是外文系教授,并不在中文系,也不是主任”^②。在其影响下,不久就出现了一些新的说法。以1986年(闻一多殉难40周年)出版的部分书籍为例,就有说是“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系主任”的^③;有只说是“外文系教授”的^④;有说是先任“外文系教授”,后任“文学院首任院长兼中文系主任”的^⑤。但是更多的著作还是沿用“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”这一流传最久、曾得到普遍认同的说法^⑥,一些注重稳定性、准确性的工具书类,更是如此^⑦。

这本是一个具体的史实问题,正确的答案只能有一个,标准就是历史的真实。其所以弄得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,归根结蒂,还是缺少可靠的事实依据。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,下面提出几条有关的历史材料,作一考证。

(一)民国十八年度《国立武汉大学一览》(以下简称《一览》)中《教职员一览》记载:闻一多系于“十七年八月”到校,职务“文学院院长”,“教授”。

(二)民国十九年度《一览》中《沿革概要》记载:“十七年九月大学成立……闻一多教授任文学院院长。”“十九年六月……文学院院长闻一多氏辞职。”

以上两条,证明闻一多在武大的时间为1928年8月至1930年6月,所任职务是教授、文学院院长。至于是否兼任中文系(或外文系)主任,则待进一步查证。

(三)民国十八年度《一览》中“法规”栏所载1929年11月制定、经“教育部指定核准”的《国立武汉大学组织规程》第3章第10条所附《说明》,内有“本校系于民国十七年成立,本科各学系迄今尚仅有一年级或二年级,未能语于充分完成,各学院现时仅设有院长,至于系主任则拟稍缓再依法设置”等语。据此,1929年各学院还只有院长,没有系主任。何时才有系主任,看下一条:

(四)据《国立武汉大学周刊》(以下简称《周刊》)第67期(1930年9月28日)载《第九十次校务会议常会记

录》，得知1930年9月23日举行的这次会议，讨论了“本学年应否增设系主任案”，“议决：本年度各系已有三年级者，概依照大学组织法设系主任，任期一年，院长得兼系主任。各教员所属学系表由教务长会同各院长商议制定之。”又，同期周刊“校闻”栏《系主任聘定消息》报导，当年全校有六个系得设系主任，其中文学院有中文、外文二系。“系主任人选已由学校聘定……刘璜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，陈源文学院外国文学系主任”。

据以上材料，武大文学院中文、外文两系于1930年9月始设系主任。闻一多辞职离校是在同年6月，因此可以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，闻一多在武大期间，不曾、也不可能担任中文系或外文系主任。

二、中文系教授还是外文系教授

这个问题也有不同说法。

梁实秋先生说：“一多到了武汉，开始专攻中国文学，这是他一生中的一大转变。……一多是在开始甩去文学家的那种自由欣赏自由创作的态度，而改取从事考证校订的那种谨严深入的学风精神。作为一个大学的中文教授，也是非如此转变不可的”⁷⁰。季镇淮先生有相似的看法：“由于岗位工作的需要，他不得不专攻中国古代文学。《杜少陵年谱会笺》便是最初学术研究的成果。”⁷¹这都是从闻一多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工作，说明他是在中文系。这也是多数人的看法。

程千帆先生的意见不同。他说，闻一多“是外文系教授，并不在中文系……虽然当时他已开始研究唐诗，并发表了《少陵先生年谱会笺》”⁷²。这里没有说明根据是什么，但从1929年度《一览》刊载的《各学院及预科课程》上看到，闻一多当时没有在中文系开课，他开的是外文系第一学年的“英诗初步”（必修课）。

两种说法，各有所据。我们还是再看看历史记载是怎样的。

在上一节提到过的1929年的《教职员一览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闻一多是文学院教授、院长，但是看不到“中文系教授”或“外文系教授”的记载。实际上，其他许多教授在什么系也不能从这个表上看出来。原因是这个表的编排方法是把所有教师按职称归类后，再按学院以姓氏笔画为序排列，而不是按系排列⁷³。虽然各人名下有“所任学科或职务”一栏，但多数人都只写了某学科或某学院，而不写某系，如陈源写的“文学院教授”，刘璜写的“文字学及国文”。只有很少数写明在某系的，如袁昌英写的是“外文系教授”。

为什么《教职员一览》只按院而不按系排列？为什么教员不写明自己所属学系？究其原因，当是前引《组织规程》所附《说明》中所说，当时学系建设尚处于草创阶段，“未能语于充分完成”，有的系刚成立，有的还在筹备。例如，最初文学院只有中文、外文两系，“所有哲学、教育及历史等课程都附设于这两系”⁷⁴。因此，不仅没有设系主任，教员（至少是部分）也没有定位，人事上还没有系一级的正式编制，统一属于学院。这一点，从后来校务会议关于增设系主任案的决议中“各教员所属学系表由教务长会同各院长商议制定之”一语，就可得到证明。显然，如果“各教员所属学系”原来就定好了，那就不会再要教务长和各院长会同“商议制定之”了。

再一个情况是，当时武大聘请教授，都是聘为某学院教授，不用系的名义。这在历次校务会议关于聘请教授的记录上可以看到，因此，不论在什么系工作的，习惯都称之为某学院教授，院长更不用说，都是称某学院教授兼院长的。

至于闻一多，他在外文系任课也好，负责中文系工作也好（这一点下文还要谈及），作为文学院院长，他本不属于某个系，只应说是“文学院教授”。

三、关于闻一多怎样来武大的一种说法

闻一多是怎样来武大的，我们至今还不甚了然。一般传记、年谱大多略而不谈，或是一笔带过，如说是“应桑梓之约”，并不具体。

梁实秋在《谈闻一多》一书中这样写道：1928年“秋后王雪艇（即王世杰——引者注）先生约他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，他便毅然离开南京，搬到武昌附近的珞珈山去了。”

这个说法，当然很多人都知道，但似乎还没有看到什么传记著作采用。既然关于闻一多来武大问题的材料现在还很少，更没有共同一致的说法，那么也就不妨把梁实秋这一说拿来考察一下，看看它的可靠性如何。

梁实秋是闻一多早年的同学、挚友,交往密切。闻一多来武大之前,先在上海待过一阵,不久到南京,梁实秋这时一直在上海。二人都曾担任1928年3月在上海创刊的《新月》杂志的编辑。闻一多离开武大后,又去上海。他们应青岛大学负责人杨振声(曾任《现代评论》文艺编辑)之邀,同赴青岛大学任教,共事两年。从这段经历看,梁实秋对闻一多当时的情况,应当是比较了解的。因此,他所写的回忆,也应当是有所依据的。

梁实秋在他的这本书开头就声明,他所谈的是抗战前的闻一多,“亦即是诗人学者之闻一多”,对于抗战后成为“斗士”的闻一多,他自称“一概不知”,也不谈。这后者当然是故意回避,且不管他。至于对前期的一些具体事实,写得还是比较慎重的。例如谈到1927年闻一多在武汉政府总政治部的情况,他只是说:“这一段经验,一多以后没有和我谈起过,想来这一段经验不是怎样愉快的。”谈到闻一多后来来到南京土地局任职,也只说:“所任究系何职,他从来没对我讲起过,无论如何那总是人地不宜的一个职务。”这就说明他所写的只是闻一多告诉他的,并不无中生有。当然,回忆文章也不能当作信史看,因为可能有记忆错误或因其他原因造成的失实。如梁实秋这里说的闻一多搬到珞珈山一事,就不符合实际,也许闻一多和他谈到过珞珈山,使他后来误记,其实当时珞珈山校舍还未建成。不过这是细节。至于他所说王世杰约闻一多去武大这一主要事实能否成立,可以先从王世杰及现代评论派与武大的关系,以及闻一多与他们的关系谈起。

有传记写到闻一多离开武大的原因时,认为是以王世杰为首的现代评论派凭借权力排斥异己所致。这个说法如何,以后再谈。不过说“以王世杰为首的现代评论派”掌握学校大权,是属实的。自从1928年7月国民政府大学院(后改为教育部)决定筹建武汉大学,现代评论派一部分主要人物就积极参与其事。王星拱、李四光、周鲠生都是筹备委员会成员。前前后后来武大的现代评论派及与之有关的人士,还有皮宗石、燕树棠、梁明致、陈源、王世杰、袁昌英、杨端六、钱端升、李剑农、沈从文等。有人说,“武汉大学事实上成为《现代评论》社大本营”^①,不无根据,虽然《现代评论》杂志在1928年12月已经停刊。在武大的现代评论派成员不仅多为学校的骨干,而且不少人位居要津。正是在现代评论派执掌学校大权的背景下,才会有王世杰约闻一多来武大的事实。

这里有一个疑点是需要解释的:王世杰是在1929年3月才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(此前校长一职由湖北省教育厅长刘树杞代理),又如何能在1928年8月将闻一多约来呢?其实,王世杰在来武大任校长前,早就关注着并干预了武大事务。例如,武大成立后将举行第一次开学典礼时,校务会议就作出“电催周鲠生、王雪艇、王抚五(即王星拱——引者注)先生到校再定期举行”的决议^②。他在武大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可见。王世杰在就任校长时表示,他来武大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有一流水准的新大学。在谈到办学主张时,他把拥有“良好的教授”列为新大学的必备条件之一^③。后来他又多次谈到这一问题,认为“教授的添聘”,是“困难而不容缓办的事”^④。这并不是他到学校以后才有的思想,正如他自己上任时所说,他来武大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同时,这也不是王世杰一个人的思想。现代评论派的其他负责人也看到,要办好武大,非多争取人才不可。但这又是很困难的。原因不仅如王世杰所说,“拿中国学者与学校作比,真是供不应求”^⑤,还因为当时武大本身条件的限制。武大一开始筹建,他们就积极招兵买马,但是连陈源也对胡适说:现代评论的一部分朋友“想到武昌去办大学。他们要我同去,可是武昌这地方,我们却不大愿意去。”^⑥(当时陈源、凌叔华夫妇正在日本游历,不久他们还是到了武大)周鲠生也说:“武汉大学因为环境的关系,很不容易延致国内专门学者到这个地方来讲学”,他希望改善条件,“多罗致国内的专门人才到此”^⑦。扩大教师来源,吸收更多的优秀人才,已成为他们的共识。因此还没有到武大的王世杰,可能早把为武大物色名流教授作为一项迫切的任务了。

闻一多是最早来武大的一批教授之一。他不是现代评论派成员,但他们有一定的关系。1925年他留美归来不久,就“正式加入新月社”,与徐志摩“相见如故”^⑧。新月派与现代评论派的关系密切,是人所共知的。闻一多通过徐志摩,得以认识现代评论派一些人。其时闻一多与一同回国的余上沅等,为实现梦想已久的“国剧运动”和创建“北京艺术剧院”的计划,谋求与他们合作。“志摩、叔存、通伯(即陈源——引者注)和‘新月社’的朋友们,都愿意帮忙”^⑨,彼此颇为融洽。五卅运动期间,闻一多还在《现代评论》连续发表多首爱国诗。王世杰是《现代评论》自始自终的主要负责人,虽不知道他与闻一多是否有过直接交往,但他至少是会知道闻一多其人的。

王世杰去武大之前,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任职,闻一多此时也正在南京。这样,当王世杰意欲为武大搜寻人才时,把眼光落到闻一多身上,更是顺理成章的事了。而就闻一多这方面来说,虽然正在第四中山大学(后改为中央大学)外文系任教,然而他的兴趣却已转向了中国古代文学方面。两年前海就对友人说过:“数月以来仅得诗

一首,且不佳。惟于中国文学史,则颇有述作。意者将来遂由创作者变为研究者乎?”^⑨(这种转变不是偶然的,有其社会的、思想的深刻根源,另文再论)王世杰约他去武大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,正与其志趣相合,况且又是回家乡(王世杰也是湖北人,也可谓“桑梓之约”了),自然就“毅然”前往了。这件事对双方来说,都是既有需要,又有可能,故得以实现。

还有两点应该说明的:(一)王世杰当时还不是武大校长,故他的作法对闻一多而言,是邀约,对学校当局而言,是举荐。(二)如前所述,闻一多到武大后并没有担任中文系主任,但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设主任之故,不能以此来否定梁实秋的说法。根据一些情况来看,闻一多虽然不是系主任,但中文系的工作很可能是由他负责的。他还担任了其他中文方面的工作,如武大预科国文学科委员会的委员长(陈源是英文学科委员长)。他的“专攻中文”,他不上中文系的课,而上驾轻就熟的“英诗初步”之类,无不是想在一段时间里集中时间、精力,为以后的中文教学作更扎实的准备。虽然他不久就因意外的变故而突然离开武大,但以后他到别的学校,终其一生都是从事中文教学和研究。这也可以说明他来武大原是打算担任中文系主任的,而且他在武大确实已经开始向中文方面的转变。

以上是根据有关事实,对梁实秋提出的王世杰约闻一多去武大一事的分析和推理,缺乏直接证据,姑且备此一说,供研究者参考。

注 释:

- ① 原载《联大八年》,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7月出版(实际出版当在9月后)。
- ②⑩ 《关于胡适和闻一多》,《新文学史料》1980年第2期“来信摘登”。
- ③ 《闻一多先生年谱》,《闻朱年谱》,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。
- ④ 《闻一多年表》,《闻一多作品欣赏》,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2版。
- ⑤ 《闻一多在武汉》,《武汉文学艺术史料》第3辑,武汉市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印,1986年10月。
- ⑥ 如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的《闻一多》,北京大学画刊社1986年6月出版的《闻一多画传》。
- ⑦ 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的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中国文学Ⅰ》“闻一多”条,以及后来多家出版的《中国现代文学词典》,《中国现代文学手册》等。
- ⑧ 《谈闻一多》,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1月初版。
- ⑨ 《闻一多先生事略》,《闻一多纪念文集》,三联书店1980年8月第1版。
- ⑪ 1930年起此表改为《教职员履历》,1936年才改按院系编排,在此以前教员所属学系一直没有明确记载。
- ⑫ 《文学院概况》,《民国十九年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》。
- ⑬ 秦贤次,《凌叔华年表》,《凌叔华小说集Ⅰ》附录,台北洪范书店1984年11月初版。
- ⑭ 《第十一次校务会议记录》,《国立武汉大学周刊》第2期,1928年12月7日。
- ⑮ 《王校长莅校欢迎会志盛》,《国立武汉大学周刊》第23期,1929年5月27日。
- ⑯ 《第22次总理纪念周记录》,《国立武汉大学周刊》第24期,1929年6月3日。
- ⑰ 《本大学开学典礼时校长及各学院教授代表演说词》,《国立武汉大学周刊》第29期,1929年9月30日。
- ⑱ 《陈源致胡适(1928年7月30日)》,《胡适往来书信选》上册,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1版。
- ⑲ 《本大学第十一次总理纪念周记录》,《国立武汉大学周刊》第12期,1929年3月11日。
- ⑳ 《致闻家驊(1925年8月11日)》,《闻一多书信选集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。
- ㉑ 上沅,《一个半破的梦》,《晨报副镌·剧刊》第15号,1926年9月23日。
- ㉒ 《致饶孟侃(1926年冬)》,《闻一多书信选集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。

(责任编辑 张炳煌)